

主编 李天纲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哲学（第二辑）

The Five Important Dialogues of Plato

柏拉图五大对话集

〔希腊〕柏拉图(Plato)著 郭斌稣 景昌极 合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Press

主编 李天纲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哲学（第二辑）

The Five Important Dialogues of Plato

柏拉图五大对话集

「希腊」柏拉图（Plato）著 郭斌稣 景昌极 合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柏拉图五大对话集/李天纲主编.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7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哲学)

ISBN 978-7-5520-1739-7

I. ①柏… II. ①李… III. ①柏拉图主义 IV. ①B502.23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32202号

柏拉图五大对话集

主 编: 李天纲

编 纂: 赵 炬

责任编辑: 唐云松

特约编辑: 陈宁宁

封面设计: 清 风

策 划: 赵 炬

执 行: 取映文化

加工整理: 嘎 拉 江 岩 牵 牛 莉 娜

责任校对: 笑 然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顺昌路 622 号 邮编 200025

电话总机 021-63315900 销售热线 021-53063735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排 版: 上海三联读者服务合作公司

印 刷: 常熟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0×900毫米 1/16开

印 张: 24

字 数: 320千字

版 次: 2017年4月第1版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20-1739-7/B.151

定价: 114.00元 (精装)

民国西学：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序

李天纲

继唐代翻译印度佛经之后，二十世纪是中文翻译历史上的第二个高潮时期。来自欧美的『西学』，以巨大的规模涌入中国，参与改变了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这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是罕见的。域外知识大规模地输入本土，与当地文化交流信息，激发思想，乃至产生新的理论，全球范围也仅仅发生过有数的那么几次。除了唐代中原人用汉语翻译印度思想之外，公元九、十世纪阿拉伯人翻译希腊文化，有一场著名的『百年翻译运动』之外，还有欧洲十四、十五世纪从阿拉伯、希腊、希伯来等『东方』民族的典籍中翻译古代文献，汇入欧洲文化，史称『文艺复兴』。中国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大量翻译欧美『西学』，可以和以上的几次翻译运动相比拟，称之为『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中国的文艺复兴』并不过分。

运动似乎是突如其来，其实早有前奏。梁启超（1873-1929）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自明末徐光启、李之藻等广译算学、天文、水利诸书，为欧籍入中国之始。』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发动的明末清初天主教翻译运动，比清末的『西学』早了二百多年。梁启超有所不知的是：利、徐、李等人不但翻译了天文、历算等『科学』著作，还翻译了诸如亚里士多德《论灵魂》（《灵言蠡勺》）、《形而上学》（《名理探》）等神学、哲学著作。梁启超称明末翻译为『西学东渐』之始是对的，但他说其『范围亦限于天（文）、（历）算』，则误导了他的学生们一百年，直到今天。

从明末到清末的『西学』翻译只是开始，而且断断续续，并不连贯成为一场『运动』。各种原因导致了『西学』的挫折：被明清易代的战火打断；受清初『中国礼仪之争』的影响；欧洲在1773年禁止了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以及儒家保守主义思潮在清代的兴起。鸦片战争以后很久，再次翻译『西学』，仍然只在上海和江南地区。从翻译规模来看，以上海为中心的翻译人才、出版机构和发行组织都比明末强大了，影响力却仍然有限。梁启超说：『惟（上海江南）制造局中尚译有科学书二三十种，李善兰、华蘅芳、赵仲涵等任笔受。其人皆学有根底，对于所译之书责任心与兴味皆极浓重，故其成绩略可比明之徐、李。』梁启超对清末翻译的规模估计还是不足，但说『戊戌变法』之前的『西学』翻译只在上海、香港、澳门等地零散从事，影响范围并不及于内地，则是事实。

对明末和清末的『西学』做了简短的回顾之后，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二十世纪的中文翻译，或曰中华民国时期的『西学』，才是称得上有规模的『翻译运动』。也正是在二十世纪的一百年中，数以千计的『汉译名著』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必读教材。1905年，清朝废除了科举制，新式高等教育以新建『大学堂』的方式举行，而不是原来尝试的利用『书院』系统改造而成。新建的大学、中学，数理化、文史哲、政经法等学科，都采用了翻译作品，甚至还有西文原版教材，于是，中国读书人的思想中又多了一种新的标杆，即在『四书五经』之外，还必须参考一下来自欧美的『西方经典』，甚至到了『言必称希腊、罗马』的程度。

我们在这里说『民国西学』，它的规模超过明末、清末；它的影响遍及沿海、内地；它借助二十世纪的新式教育制度，渗透到中国人的知识体系、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中，这些结论虽然都还需要论证，但从一般直觉来看，是可以成立的。中国二十世纪的启蒙运动，以及『现代化』、『世俗化』、『理性化』，都与『民国西学』的翻译介绍直接有关。然而，『民国西学』到底是一个多大的规模？它是一

个怎样的体系？它们是以什么方式影响了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得到认真研究，我们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还有，哪些著作得到了翻译，哪些译者的影响最大？『西学东渐』的代表，明末有徐光启，清末有严复，那『民国西学』的代表作在哪里？这一系列问题我们并不能明确地回答，原因就在我们对民国翻译出版的西学著作并无一个全程的了解，民国翻译的那些哲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西学』著作，束之高阁，已经好多年。

举例来说，1935年，上海生活书店编辑《全国总书目》，『网罗全国新书店、学术机关、文化团体、图书馆、政府机关、研究学会以及个人私家之出版物约二万种』。就是用这二万种新版图书，生活书店编制了一套全新分类，分为：『总类、哲学、社会科学、宗教、自然科学、文艺、语文学、史地、技术知识』。一瞥之下，这个图书分类法比今天的『人大图书分类法』更仔细，因为翻译介绍的思潮、学说、学科、流派更庞大。尽管并没有统一的『社科规划』和『文化战略』，『民国西学』却在『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推动下得到了长足发展。查看《全国总书目》（上海，生活书店，1935），在『社会科学·社会学一般·社会主义』的子目录下，列有『社会主义概论、社会主义史、科学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乌托邦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议会派社会主义』等；在『社会科学·政治·政体政制』的子目录下，列有『政治制度概论、政治制度史、宪政、民主制、独裁制、联邦制、各种政制评述、各国政制、中国政制、现代政制、中国政制史』等，翻译、研究和出版，真的是与欧美接榫，与世界同步。1911年以后的38年的『民国西学』为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而我们却长期忽视，不作接续。

编辑出版一套『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把中华民国在大陆38年期间翻译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著作重新刊印，对于我们估计、认识和研究『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中国的文艺复兴』，接续当

时学统，无疑是有着重要的意义。1980年代初，上海、北京的学术界以朱维铮、庞朴先生为代表，编辑『中国文化史丛书』，一个宗旨便是接续1930年代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主编『中国文化史丛书』，重振旗鼓，『整理国故』，先是恢复，然后才谈得上超越。遗憾的是，最近三十年的『西学』研究却似乎没有采取『接续』民国传统的方法来做，我们急急乎又引进了许多新理论，诸如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还有『老三论』、『新三论』、『后现代』、『后殖民』等等新理论，对『民国西学』弃之如敝屣，避之唯恐不及。

民国时期确实没有突出的翻译人物，我们是指像严复那样的学者，单靠『严译八种』的稿酬就能成为商务印书馆大股东，还受邀担任多间大学的校长，几份报刊的主笔。但是，像王造时（1903-1971）先生那样在『西学』翻译领域做出重要贡献，然后借此『西学』，主编报刊、杂志，在『反独裁』、『争民主』和『抗战救国』等舆论中取得重大影响的人物也不在少数。王造时的翻译作品有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摩瓦特的《近代欧洲外交史》、《现代欧洲外交史》、拉铁耐的《美国外交政策史》、拉斯基的《国家的理论与实际》、《民主政治在危机中》。1931年，王先生曾担任光华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政治系主任，后来创办了《主张与批评》（1932）、《自由言论》（1933），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2）。他在上海舆论界发表宪政、法治、理性的自由主义，他在大学课堂上讲授的则是英国费边社社会主义、工联主义和公有化理论（见王造时著《荒谬集·我们的根本主张》，1935，上海，自由言论社）。非常可惜的是，王造时先生这样复杂、混合而理想主义的政治学理论和实践，在最近三十年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中并无讨论，原因显然是与大家不读，读不到，没有再版其作品有关。

我们说，『民国西学』本来是一个相当完备的知识体系，在经历了一个巨大的『断裂』之后，学者并没有好好地反省一下，哪些可以继承和发展，哪些应该批判和扬弃。民国时期好多重要的翻译著作，我

们都没有再去翻看，认真比较，仔细理解。『改革、开放』以后，又一次『西学东渐』，大家只是急着去寻找更加新颖的『西学』，用新的取代旧的，从尼采、弗洛伊德……到福柯、德里达……就如同东北谚语讽刺的那样：『熊瞎子掰包谷，掰一个丢一个。』中国学者在『西学』宝库中寻找更新式的装备，在层出不穷的『西学』面前特别害怕落伍。这种心态里有一个幻觉：更新的理论，意味着更确定的真理，因而也能更有效地在中国使用，或者借用，来解决中国的问题。这种实用主义的『西学观』，其实是一种懒惰、被动和浮躁的短视见解，不能积累起一个稍微深厚一点的现代文化。

讨论二十世纪的『西学』，一般是以五四『新青年』来代表，这其实相当偏颇。胡适、陈独秀等人固然在介绍和推广『西学』，倡导『启蒙』时居功至伟，但是『新文化运动』造成不断求新的风气，也使得这一派的『西学』浅尝辄止，比较肤浅，有些做法甚至不能代表『民国西学』。胡适先生回忆他们举办的《新青年》杂志，有一个宗旨是要『输入学理』，即翻译介绍欧洲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知识，他还大致理了一个系统，说『我们的《新青年》杂志，便曾经发行过一期『易卜生专号』，专门介绍这位挪威大戏剧家易卜生，在这期上我写了首篇专论叫《易卜生主义》。《新青年》也曾出过一期『马克思专号』。另一个《新教育月刊》也曾出过一期『杜威专号』。至于对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日耳曼意识形态、盎格鲁·萨克逊思想体系和法兰西哲学等等的输入，也就习以为常了。』（唐德刚编译：《胡适口述自传》，北京，华文出版社，1992年，第191页）。胡适晚年清理的这个翻译目录，就是那一代青年不断寻找『真理』的轨迹。三四十年来，他们从一般的人性论学说，到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从不列颠宪政学说，到法兰西暴力革命理论、德意志国家主义思想，再到英格兰自由主义主张，大致就是『输入学理』运动中的全部『西学』。

胡适一语道破地说：『这些新观念、新理论之输入，基本上为的是帮助解决我们今日所面临的实际

问题。』胡适并不认为这种『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的做法有什么不妥。相反，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接受『西学』的方法论，大多认为翻译为了『救国』，如同进口最新版本的克虏伯大炮能打胜仗，这就是『天经地义』。今天看来，这其实是一种庸俗意义的『实用主义』，是生吞活剥，不加消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简单思维，或曰：是『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从我们收集整理『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的情况来看，『民国西学』是一个比北大『启蒙西学』更加完整的知识体系。换句话说，我们认为『五四运动』及其启蒙大众的『西学』并不能够代表二十世纪中国西学翻译运动的全部面貌，在大的『启蒙西学』之外，还有上海出版界翻译介绍的『民国西学』。或许我们应该把『启蒙西学』纳入『民国西学』体系，『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

我们认为：中国二十世纪的西学翻译运动，为汉语世界增加了巨量的知识内容，引进了不同的思维方式，激发了更大的想象空间，这种跨文化交流引起的触动作用才是最为重要的。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变得不古不今，不中不西，并非简单的外来『冲击』所致，而是由形形色色的不同因素综合而成。外来思想中包含的进步观点、立场、方案、主张、主义……具有普世主义的参考价值，但都要在理解、消化、吸收后才能成为汉语语境的一部分，才会有更好的发挥。在这一方面，明末徐光启有一个口号可以参考，那便是『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先翻译』。反过来说，『翻译』的目的，是为了中西文化之间的融会贯通，而非搬用；『会通』的目的，不是为了把新旧思想调和成良莠不分，而是一种创新——『超胜』出一种属于全人类的新文明。二十世纪的『民国西学』，是人类新文明的一个环节，值得我们捡起来，重头到底地仔细阅读，好好思考。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邀我主编『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献弁言于此，是为序。

「希臘」柏拉圖（Plato）著 郭斌龢 景昌極 合譯

柏拉圖五大對話集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五月初版

序

是書所輯柏拉圖對話篇凡五。前三篇昌極譯。後二篇斌穌譯。曾陸續登學衡雜
誌三、五、十、二十、四十三、四十八、六十九、七十六各期，以時計之，自開譯至付印，蓋十二
年於茲矣。是書之譯，吳雨僧先生實主張之。譯後又取各英文譯本暨希臘文原本，詳
爲之校，約爲之注，期不通西文者皆能窺見原書精采而無遺。補苴罅漏，其勞實多。謹
誌於此，以申謝忱。外附導言及埃及提論，斌穌撰。理型說略評，昌極撰。庶幾首尾略具，稱
譏互見，以供有志柏氏思想者之參考云爾。初稿付印後，重勞編譯館周其勳先生等
爲任標點校閱之責，用力綦勤，亦所至感。

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

導言

柏拉圖以紀元前四二七年生於雅典，或言生於伊琴奈（Aegina）島。父亞歷斯敦（Ariston）相傳爲雅典諸王後，母裴立克丁（Perictione），系出名門，大立法家梭倫（Solon）其遠祖也。舅查密迪斯（Charmides）及克里底亞（Critias）皆貴族。四零四年，比羅奔尼蘇戰（Peloponnesian War 431-4B. C.）後，雅典瓦解。少數黨三十人，起而執政八月，兩舅爲之魁。柏氏以閥閱世家，遭逢時變，故一生究心政理，謂哲學家應並爲政治家焉。柏氏早歲學爲詩文，所作短詩，猶有存者。方是時，四方遊士，麇集雅典，以非常異義可怪之論相炫鬻，雅典少年趨之若狂。柏氏初爲克雷都拉（Cratylus）弟子，聞其誦述海拉克利圖氏（Heraclitus）萬物流變無定之言。若與非教義（Orphism）之主靈肉判分，比塔哥拉學派（Pythagoreans）之宗教組織，柏氏亦稍知之。年二十，始

從蘇格拉底遊。探析名理，講論道德，思想爲之不變。三九九年，雅典人誣蘇氏瀆神惑民，下之獄，使仰藥死。柏氏大戚，去而之鄰邑麥加拉（Megara）。復西遊至南意大利，與比塔哥拉學派諸人相往還，習其數理之學與靈魂流轉之說。三八八年，柏氏居西西里島，爲霸主迪安尼斯第一（Dionysius I）賓客。迪安尼斯壻狄恩（Dion），年少有幹才，敬慕柏氏，事以師禮。然迪安尼斯方汲汲於功利，不能用柏氏也。或言柏氏且遠遊埃及，晚年著法律篇，於埃及之美術音樂書數，言之至詳，一若親臨其地者。惟於史無徵。三八七年，柏氏年四十，歸雅典。建亞愷德麥學院於城西北隅，歐洲之有大學自此始。學院既立，四方來學者衆。院制仿比塔哥拉學派。師生飲食起居與共，有若家人。其學以哲學數學爲主。蓋欲力祛當日詭辨浮誇之弊，使學生以真理爲歸，極深研幾，闡然自修，不以世俗得失好惡縈其心。亞里士多德年十八，來學，留二十年始去。其他弟子亦多有聲於時。各邑國制憲立法，柏氏弟子每贊襄其間。三六七年，柏氏年六十，垂老矣。然用世行道之志，未嘗一日忘。會迪安尼斯第一卒，子迪安尼斯第二繼之。幼

失學，不知爲政。執政柄者，實爲狄恩。狄恩素慕柏氏，欲招之往，以教其少主。時迦太基國勢日張，思席捲西西里全島。柏氏懼西歐希臘文明之亡，毅然往。既至，首教迪安尼斯第二以幾何。迪安不耐，且忌狄恩功高，未數月，狄恩罷去。柏氏再返雅典。後六年，柏氏復往西西里島，居一載，爲迪安尼斯第二左右羣小所惡，幾遇害。柏氏乃還雅典，不復出。講學著書，以終其身，卒時年八十。

柏拉圖著作甚富，西方古代作家，其遺著能流傳至今，歷二千餘年而無闕失者，獨柏氏一人，不可謂非大幸也。牛津大學所刻原文柏拉圖全集（龐乃德 J. Burnet 校）載對話四十三篇。內七篇，自來學者皆認爲僞。餘三十六篇，則紀元前三世紀後之學者雖大都信以爲真，然於其中阿克拜第上篇（Alcibiades I）與伊壁諾米篇（Epinomis）固時有微辭。至近代十九世紀，學者疑古成風，以辨僞爲樂事，尤以德人爲甚。如亞士（Ast）齊萊（Zeller）之疑法律篇。郁勃韋（Ueberweg）溫德爾彭（Windelband）輩之疑巴門奈底篇，莎斐斯德篇（Sophistes）與波立底克篇（Politicus）。齊萊、

威拉穆維 (Wilamowitz) 塞司彌爾 (Susmihl) 之疑哀盜篇 (Ion) 查希密德 (Sch
arschmidt) 最趨極端，竟謂可信者僅有九篇。然自英儒甘貝爾 (Lewis Campbell) 從
字句文體方面，用考證法，力辨莎斐斯德篇與波立底克篇之非僞後，風氣漸變。蹈隙
尋瑕之徒，稍稍斂跡。學者於真僞之分，已漸歸一致。三十六篇中，阿克拜第下篇 (Alc
ibiades II) 希巴克篇 (Hiparchus) 亞麥托篇 (Amatores) 塞亞各篇 (Theages) 克立
托封篇 (Clitophon) 曼諾篇 (Minos) 其爲僞作無疑。至阿克拜第上篇、哀盜篇、米奈仁
納篇 (Menexenus) 希璧亞上篇 (Hippias Major) 伊璧諾米篇及書札 (Epistles) 則真
僞尙無定論。四篇僞，德 (B. Jowett) 英譯本，載二十
四篇，附錄不甚可信者五篇。本書所譯五篇，爲柏氏著作之重要
者。至著作先後之次序，雖諸家所論互異，不能一一確定，然就古書中關於對話之記
載，及各篇之內容文體語氣考之，其次序亦約略可觀。大抵柏氏早年所作，以蘇格拉
底爲中心，如此編之蘇格拉底自辨篇似爲柏氏最初之作。克利陀篇及斐都篇則記
蘇氏臨難時之言行。至稍晚出之筵話篇、斐德羅篇等。雖時有蘇氏人格之描寫，其思

想之重心，則已由蘇格拉底而易爲柏拉圖矣。理想國篇以後諸篇，蘇格拉底退而爲次要人物。至法律篇中，竟不復有蘇氏之名焉。

柏氏對話三十六篇中，次要之十六篇，可自爲一類。其餘重要之二十篇，按其內容及作成之先後，略可分爲七類：(1) 查密迪斯篇 (*Charmides*) 普羅塔果拉篇 (*Protagoras*) 高其亞篇 (*Gorgias*) 三篇爲蘇格拉底問答類。篇中僅將問題之要點及其困難指出，而皆無結論。(2) 由塞弗洛篇 (*Euthyphro*) 自辨篇 克利陀篇 斐都篇 四篇爲傳記類。記蘇氏之受審與就義，爲天壤間留真正哲學家之典型，百世之下，聞其風者，莫不興起。(3) 米諾篇 (*Meno*) 筵話篇 斐德羅篇 三篇爲埃提類。述埃提 (*Ideas*) 之性質與埃提世界之莊嚴華美，使人歡喜贊歎，寤寐以求。(4) 集以上三類論辨之大成，則有理想國篇。此篇着眼在道德而不在政治。篇首所問，篇末所答者，實爲個人道德問題。道德之極詣，在求內心之和諧而不在趨避外界之賞罰。使內心諸部各得其位，各得其宜之一貫精神，柏氏稱之曰「義」 (*Dikaiousunē*)。義者必樂。惟哲學家爲能義，

爲能樂。柏氏之哲學家，理想人也。擴而大之，則爲理想國。柏氏恐言理想人之不易明，故倍其比例，以言理想國。言國所以言人，言政治所以言道德也。自查密迪斯篇以至理想國篇，蘇格拉底與諸詭辨家所爭者，在證明道德之自有其自給性與永久性，不隨外界形勢利害爲轉移。而道德必從智識中產出，始爲真道德。理想國篇以後諸篇，則重心由道德移至智識。所討論者，大都爲玄學上之問題，如何者爲智識，理知之限度，智識與成見之區別，埃提論與智識之關係等。故（5）克雷都拉篇，由塞提麥篇（Euthydemus）塞阿德都篇（Theaetetus）巴門奈底篇，可稱爲玄學類。（6）泰米斯篇（Timaeus）與斐里勃篇（Philebus）可稱爲宇宙論類。泰米斯篇論宇宙之構成，斐里勃篇論快樂與智識之高下，因及宇宙間事物之次序。（7）第七類爲法律篇。此篇爲晚年之作。匯集平生言論，加以修正，與理想國篇後先輝映。惟一則偏於理想，一則較切實際耳。至次要之十六篇，或所述無關宏旨，且多僞作，或所論雖要，但無新義。初讀柏氏書者，可暫置之。其中書札篇集柏氏手札十三通，真僞迄無定讞，要爲研究柏氏生